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六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编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52794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

第十六輯

1965

11.37-472
506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编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六五年五月·成都

(内部发行)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

第十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员会 編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晚报印刷厂印刷

1955年5月第一次印刷

本期定价: 

0.87元

編輯 凡 例

-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部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借供研究历史和地方文献者的参考。
- 二、本选辑所选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 三、为了帮助历史工作者研究的需要并保存历史资料，本选辑所选范围，并包括重要原始档案、遗作手稿以及仅见孤本（包括报纸刊物）中的珍贵史料。
- 四、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 五、本选辑对来稿可以加以摘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大革命时期四川軍閥易帜述概.....	小 波 (1)
西康建省及刘文輝的統治	张为炯 (23)
邓秀廷对彝族的血腥統治	谢毅东 (54)
张篤伦在西昌伪行轅罪証点滴	王柔德 (76)
广汉“匪世界”时期的軍軍匪匪.....	侯少煊 (82)
1921年德阳广汉道中阻匪记.....	荀 实 (104)
反动統治时期的成都警察	熊偉云 (108)
罗泽洲在广安的罪行种种	唐代才 (130)
楊森在广安的反动罪行	唐代才 (139)
防区制下西充人民慘遇	西充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 (148)
四川軍閥混战灾祸拾零	
1917年隆昌兵匪交織慘祸.....	吳蔭秋 (154)
1926年白駒大剽隆昌.....	吳蔭秋 (157)
刘湘、白駒劫掠荣县仓谷.....	叶 之 (159)
軍閥混战中广元战祸粗描.....	孙耀庚 楊寿增 (162)
私塾回忆	李鈺夫 (166)
解放前西康藏族地区的“学差”	屈亚川 (181)

解放前四川疫情四川省志衛生志編輯組(187)

质 疑 · 补 充 · 訂 正

对《癸丑有关史料》注解的不同意见.....陆殿典(209)

关于同善社反动内幕的一点补充.....何举卿(210)

对1928年赖心辉兵力驻地的订正.....傅渊希(214)

对《一九三一年川军“援甘”之战》一文的订正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215)

对缪秋杰罪恶活动一文的几点补正.....陈况仲(216)

关于“燃料管理处”的成立时间

.....四川省志工矿志編輯組 张利源(220)

正誤表 (222)

大革命时期

四川軍閥易帜述概

小 波

一、杨森反革命两面派阴谋

1935年7月，杨森派代表到湖南，与北伐军接洽，请求广州国民政府给以名义，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35年12月10日成都《国民公报》曾述其经过：“国民革命军此次委任杨某为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初颇犹豫；嗣经杨的代表再三申说，

‘杨某虽与吴佩孚有至深关系，而其人性，说干就干，颇与革命军相近。’兼是时江西战事发生，邓主任以宜昌尚有北军卢（金山，吴佩孚的长江上游总司令）、于（学忠，第二十六师师长）各部，共有枪支二万之谱，随时有不测之虞，因与杨某以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名义，以图牵制。”但杨森接受了委令，并不立时就职，仍继续将下川东部队开赴鄂西，会同北军进犯武汉，遭到北伐军痛歼（详见本刊第十二辑《大革命时期杨森两犯武汉被歼记》）。杨在此险恶情势下，只得匆匆偕广州所派来的党代表赶赴宜昌，于11月21

日通电就革命军长职；但同时又密电吴佩孚，声称他正准备待机反攻。北伐军识破其奸，对杨军继续予以分路追歼，杨森阴谋不逞，就于12月14日从宜昌率残部狼狈逃回万县。

杨森回万惊魂未定，即令其亲信师长向成杰电驻重庆之该师参谋长叶良一，表示今后决心彻底革命，请火速转达省党部表示诚意，并立派奉节县知事陈稷安驰赴重庆，迎请杨闇公、邓勃刚（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赴万主持党务。

杨森为装潢门面，赶印各种革命标语，遍贴万县的街衢巷口。又通令下川东防地十七县知事，赶制青天白日旗备用。并且迫不及待地成立党务筹备处，以王正鋆为筹备处正主任，罗泽敷（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分子）为副主任，该军参谋长龚伯凯（达）为名誉主任。另以杨春芳、范绍增、罗颢光、包晓南、叶鳌、雷忠厚、杨汉城、郑若愚、杨懋德、姜举渭、申庸高、廖明章、陈凤池、罗仙舫、曾白元、郑元懋、韩素臣、张经富等为筹备员。并撤回派驻北京政府的代表刘泗英。同时，杨将该军党务筹备经过、人选电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国民党左派，在中共领导下），请派员指导。又电邀刘伯承赴万会商。12月19日莲花池省党部复电，要杨森撤销罗泽敷副主任职务说：

查罗泽敷去冬在渝，附和西山会议，通令重庆第七区党员加入伪市党部。今春复由石青阳（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余孽）派往内江、自贡、泸县等地组织伪市、县党部，皆有案可稽，有事可证。今不加声明，遽任要职，党纪何存？如该罗泽敷果真心悔悟，尤不得听其暧昧，混迹党内。执事既以党纪党纲为重，似此

大端，未可忽玩。务望将罗泽敷副主任撤消，并令其郑重声明，重新入党，勿过事优容也。

省党部并另给杨森一信，要杨通缉熊敷滋（杨的“讨贼军”第一路警备司令）等，并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杨不得已，遂将罗泽敷解职。熊敷滋、潘殿俊（前清解元、进步党研究系首领之一）等反动分子亦暂时离万。省党部乃派牟炼先赴万办理党务（牟继被杨森派为驻汉代表）。

莲花池省党部为维护革命实力，复于此时电杨森援助正向开县（杨的防地）撤退的顺庆武装革命起义部队：

近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诸同志率部远来，粮秣驻地，至望准情维助，以固革命实力。关于党务应协商之件甚多，承派陈履安同志来渝，自当尽力洽商。本会稍缓，亦决派同志前来详述一切也。

杨于是令所部师长罗觀光（驻开江）、白駒（道成，驻大竹），在起义军到达时，接济粮饷。

与此同时，杨森又指使向成杰、郭汝栋打电给刘桂卿（杨派驻汉代表），请求国民政府宽大既往（广州国民政府系1936年12月10日迁武昌），并促该军党代表率政工人员返万。刘桂卿于1937年1月9日复电向、郭说：

政府以惠公不能去熊（敷滋）、楊（楷昆）、朱（联元）等，即认为有碍革命工作进行；政治人员，亦难派遣。特请两公向惠公将熊等解职，嗣后再谋延用，无任盼禱。

向成杰即电转杨森，请杨“查办处理，抑或令熊等暂行回避，免使工作上发生障碍”。杨森立即复电，嘱向成杰转

电汉口，向乃电刘柱卿称：“此间为避免谣传计，熊已归里，余亦逐渐回避矣。”以上这一切，说明杨森返万后惊恐万状，急切要披上革命外衣来恢复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颓势。

杨森为表示“武力党化”，通令所部改换革命军番号，并委王正鋆为国民革命军川鄂边防第一路司令，郭汝栋为第二路司令，何金鳌为第三路司令，魏楷为第四路司令，罗颢光为第五路司令，龚伯凯为第六路司令；又委杨淑身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师师长，向成杰为第五师师长，王文雱为第七师师长，吴行光为第十一师师长，范绍增为第十三师师长，杨本人兼任第十四师师长，杨春芳为第十五师师长；又委喻孟群、李御（御良）、乔得寿、包晓南、胡伟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五个混成旅旅长；又委于渊为宪兵司令，范毅为警卫旅旅长。杨为控制所属，实行“军政集中”，在万县召开师旅长会议，设立军事委员会，各师长均为委员。根据杨所拟的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军常务委员为三人，军长为固定常委，其余常委由各师长抽签轮流充任，每次任期为一月。会上，杨迫令部属只编步兵，所有机枪大炮，限日呈报军部，由军部总汇编制。杨于是将各部缴呈之机枪六十余挺、大炮二十余门、迫击炮十二门编成机、炮两团，迫击炮一队，俱受机炮科指挥夏炯节制，直隶军部指挥。并委徐元勳为机关枪团团长，馮騰蛟为炮兵团团长。杨此举措，目的在极端加强他对部队的反动统治，加强战斗力量，以有利于实现他的反动目的。但是各部的实力削弱了，因此深为部下所不满。军委会常委轮流驻万的规定，亦首先因郭汝栋等的反对而成纸上空文。

由于蔣介石叛变革命，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改选了军事委员会，撤销了蔣所窃踞的军事委员长职务。改选后的军事委员会以邓演达、林伯渠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秘书长等职务。1927年4月9日杨森打电祝贺说：

奉大会自日通电，砥悉任命新膺，长材独运；仰宏猷之懋著，聞吉訊而欢騰。

但是也就在同一天（4月9日），杨森即将该军军党部解散。同日，四川军阀以刘湘为首，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勳、田頌尧联名发表反共拥蔣臭名昭著的青电，竟指责中共为“异党”，诬蔑中共领导革命人民反帝反封建为制造阶级斗争；对当时国民党左派撤销卖国贼蔣介石职务的革命行动诬为“排除异己”，而且公然宣称要“合力制裁”革命人民的活动；等等。武汉国民政府在一天中接得杨森不同态度之两电，乃于4月15日电川查刘、杨等青电的真伪。由于武汉逼近四川，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仍有相当力量和威望，四川军阀们不能不多少有些顾虑，只好互相推诿。刘湘于4月26日转电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要他们领衔声明，好似青电不是他（刘）的主动。杨于4月28日复电刘湘，内称：“宥电奉悉。青日通电，既经武汉来电质问，疑为窃名，仍请我公根据事实，领衔声明。谨复示遵。”这又推在刘的头上，而且含混地不提究竟“声明”什么。邓锡侯、刘文辉和刘湘一气，接着于5月2日致电杨森，内称：“吾川同人为救党救国计，对于甫公领衔发表青电，主持正义，大衡亦在其列，自属心理相同……顷接甫公来电，

谓武昌政府有删电到川，疑前所发通电必系窃名，亟应根据事实，切实声明，以期闻听不紊。拟请尊处主稿，挈銜通电查照。”而“主稿”究竟写些什么，亦丝毫不提。四川军阀们搞反革命活动，也是做得这样狡猾而可耻的。其实，刘湘这时已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反革命态度已经非常鲜明，青电正代表了四川军阀们当时的反动趋向。由于杨森已在武汉吃了当头一棒，以及他和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矛盾，在此宁汉双方相持之时，他的反共拥蒋的阴谋，在他所采取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上，也就比刘、邓等尤为狡利。当青电在武汉各报刊登后，杨森的驻武汉代表周建侯、刘柱卿、牟炼先、蓝国珉等即于4月13日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级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长及各报馆，发表如下声明：

頃閱汉口各报，发现有措词离奇之通电，并谓楊森軍长亦列名在内。建侯等深知：楊森軍长系昭对革命之人，对于党权始终拥护，对于中央始终服从，绝对不致有违背党的言论行动。恐道远传聞失实，用特先行代电声明。

这一个声明，也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电查真伪的根据，同时也是几个军阀互相推诿要杨主稿的原因，但这些都是反革命两面手法的烟幕和枝节。实际上，杨森这时已和刘湘分别接受了蒋介石所委任的第五路前敌总指挥和第五路总指挥反动军职，5月4日杨森即下了出兵合攻武汉的动员令。

二、刘湘是四川反共拥蒋首恶

在1925年大革命高潮形势下，7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勳联名通电声讨吴佩孚。赖心辉之驻汉代表张伯常，亦于此时偕刘湘、赖心辉之命潜赴长沙与唐生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第八军军长）接洽。并通过唐，引见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广州国民政府不久即分任刘湘、赖心辉、刘成勳、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各军军长。刘湘在派代表时写给唐生智的信说：

孟瀟总指挥勋鉴：因步艰难，久疏简候，中怀蕴结，彼此谅有同情……惟叶氏（开鑫）虽挫，巨奸犹存，近方蹀躞于北，正台端銳进于南之时也。以台端之雄烈，拯挈西南之賢豪，破賊必矣。窃以为今日重大之事，不仅在破賊，实在破賊以后设施之問題耳。台端胸有智珠，目营八表，即祈发摺伟抱，以启愚蒙。

从刘湘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可看到刘湘对当时大局是另有怀抱；他对唐生智送去一个秋波，目的是在和唐生智深相勾结，机会来时，企图在湘鄂、西南创造一个局面，并不是要参加当时的国民革命。若果参加革命，他也要取得预闻“破賊以后之设施问题”的地位，不自甘居于仅是“受命”的行列。因此刘湘对于国民政府给他的军长任命，深嫌地位卑下，曾要求给予他军长以上的名义。1926年12月10日《国民公报》即透露出消息：“口口方面（按指刘湘——笔者），前次虽有通电口口（按指讨吴——笔者）问题，嗣向革命军接洽，某代彼要求以一种名义，并总管川省军民两政，次亦

須軍長以上名義，節制某與某軍隊。于川中黨務，亦欲包辦。無奈國民政府對於各省，并無以上各種名義，因未允許。足見某某等與革命軍接洽，原為包辦川事，實非真欲革命……”這個消息，實道破當時劉湘的心理。

劉湘以所欲未遂，退不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職，并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勾搭，借以要挾。及至北伐軍攻克武漢和九江，楊森進犯武漢失敗，武漢國民政府因劉等意存觀望，乃責成劉湘的駐漢代表喬毅夫返川查詢。重慶蓮花池省黨部亦以道義及利害相責。劉在這一情勢下，乃于喬毅夫回重慶之第三天即12月17日，與賴心輝同在劉之川康督辦署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第二十二軍軍長職。12月30日，重慶舉行軍民聯歡大會，這個會是由蓮花池省黨部主持，大會通過了肅清反革命派、解散總土地國民黨偽四川省黨部、取締反革命報紙、取締國家主義的麻醉教育、取締反革命的宣傳、實行工農政策、取消苛捐雜稅、解散偽市工會、實行軍隊黨化等決议案。一時革命聲勢，震動山城。劉湘在就職通电中，宣告四事，說什麼“國民革命軍以扶持農工階級、解除民眾痛苦為職志。今後一切工作，當先注重農工利益與其組織，期將革命之最後之一切還諸民眾”。可是，劉湘一面就革命軍軍長職，一面同時又發出繼續兼任北方軍閥委任他的什麼督辦職務的通电：

竊湘遵令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職，雖經通电布告在案，惟川康政府未經依法改組以前，所有湘原任川康邊務督辦暨督辦軍務善後事宜旧職，仍暫兼行。一俟省區政府成立，即行通电結束。

刘湘不愿放弃旧职，表示他不愿割掉对北洋封建军阀的关系，不愿放弃独霸一方的军阀统治，尤其不愿受到革命约束，这是他的反动本质露骨的表现：要我革命，非把川省军民两政的权力都交给我不可。他在1927年1月9日在重庆总商会议场召集民众演说，更恬不知耻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个人此次所以就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职，并不是一时冲动，一时盲从，曾经考虑再三的……假使我坐视不动，则我之川康督办职，一时未必取消。况且奉张方面，如王永林等，曾派代表来川，欲加我某某等职。我所以辞官就卑，辞富居贫……。

因此刘湘就职后心常快快，但为当时革命形势所迫，仍不得不粉饰门面借以麻痹群众。于是乃召集政治讨论会，讨论革命军部组织法，筹备将军部分为军党部、军司令部、军政治部。并指派陈学池、林维干为军党部筹备员；鍾体乾、甘子言为军司令部筹备员；李佛航、萧芹瞻为军政治部筹备员。刘还故意电邀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担任该军政治部主任，以表示他的进步。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及其他反动分子，在刘湘的师长王陵基、蓝文彬等支持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1927年1月7日《国民公报》即载有《四川通讯社》消息：“渝城于云南起义纪念日（指1926年12月25日——笔者），重庆各学校之爱国青年，感于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之种种压迫，纷纷组织宣传队，在各街分头讲演，意欲引起一般人之觉悟。是日，适值中山学校讲演员，正讲至外人为什么要在我国传教……当时听者数百人，无不动容。正高兴间，突来形似学生而举动粗暴者数人，手持多数传单，

于人丛中横冲直闯，散发传单，并加以喧嚷……散传单者忽吹哨子，鸣的一声，突由鱼市街、鼎兴街、木货街等涌出多人，手持马刀、铁棍、石锤、扁担等物，向宣传员乱打。宣传员尚在凳上未防，登时倒地。同时，站立其旁之执旗人，亦受伤倒地。其余尚有宣传员三人，亦被铁棒扁担击伤……其倒地之宣传员呕血一滩，不省人事。倒地之执旗人足部受伤甚重，不能行走。该二人正在惨痛之际，复被打手拖向中营街总土地（伪国民党右派四川省党部）方面去。……次日，省商业中校讲演队正在木牌坊讲演，亦发生同样之事实。”又1927年1月4日《国民公报·夕刊》更披露：重庆著名团阀、巴县东南里联团主任曹燮阳等反动分子组织“惕社”“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等，并于1926年12月25日在重庆城内各商铺散发“有如大名片之五色国旗”，“并派讲演队三十大队散布洋纸套色五色国旗数万张，宣言数万份。”这些反革命分子凶手们，正是刘的心腹师长王陵基、蓝文彬在仰承刘的意旨下所组织的。这才是刘湘反革命两面手法的真的一面。

由于反动派横行不法，破坏革命运动，重庆工人、市民、学生纷起抗议，莲花池省党部又不断地要求刘湘实践就职通电的“四事”诺言，并实施重庆军民联欢大会各项决议案。刘不得已，乃勒令总土地伪省党部释放中山学校学生刘道融、何笏等，并将被打伤之各校学生交法庭检验；又明令撤销总土地国民党伪四川省党部，令防江巴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军事警察厅派队逮捕该伪省党部执行委员王嶽生、胡汝航、宋绍增、黄斗寅、王笠僧、金雨秋等；又封禁《长江》《江

州》《中山》等反动报纸。王陵基于是惧而向刘湘具呈，将师长、卫戍总司令、铜元局长、团务总监等职一并辞去，还表示要将刘拨给他的手枪队交还，假惺惺地似乎不愿给刘湘卖命。刘之十六师师长蓝文彬（伪省党部执行委员），亦表示要辞职。事实上，刘湘只不过玩弄了一套鬼把戏，来掩盖他的反动面目，王陵基等的辞职，做得剑拔弩张，刀矛出鞘，更是借以对革命力量施加威胁，对反动派壮声势。这时，泸州、顺庆起义部队已揭出革命军旗帜（泸州起义系1926年12月2日，顺庆起义是3日），刘湘感觉真的火（革命之火）烧眉毛，急伙同邓锡侯、刘文辉，电令邓之师长罗泽洲以优势兵力摧击顺庆革命军，并积极策动川黔军阀联合围攻泸州武装革命部队。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对两地革命军特别关注，于1926年12月29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会议名义打电话给刘湘、李家钰暨川中各师旅长，并拟派吴玉章入川调解：

查袁（品文）、陈（兰亭）、杜（伯乾）各将领，数月来迭据四川特务委员会报告，该旅长等具有革命决心，经陆（绍）派员分赴各该部作政治训练，成绩颇佳。中央并经准其必要时机，表明态度，揭出革命旗帜，免受摧残。邇来川中各军领袖，请求名义，政府已分别发表。是彼此同属革命旗帜下之军队，更无军事行动之必要。务各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如有争执，应即呈诉中央，听候解决。除派吴玉章同志即日入川调解外，特分电达，仰即遵照。

刘湘这时尚不敢公然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只得一面秘密加紧反动军事活动，一面又花言巧语做出关心“拥护”的样子来